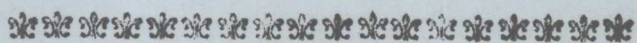


● ● ● ● ● ● ● ●
吉林大学硕士
学位论文
● ● ● ● ● ● ● ●



王明反“调和主义”之剖析



作 者：张秀华

指导教师：曹仲彬教授

专 业：中共党史

一九九三年九月

提 要

1930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根据共产国际七月决议精神，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但表现了某些调和倾向。10月间，共产国际发来了《共产国际执委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改变了七月决议对立三错误的提法，将其上升为路线错误。王明通过不正当的渠道先于中央得知十月来信的内容，于是，夸大六届三中全会的错误，在党内发动了反六届三中全会“调和主义”的斗争，并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其目的是夺取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权，以推行新的“左”倾路线。

目 录

前 言	1
一. 六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及其功过	1
二. 王明在党内率先发动反“调和主义”的斗争	1 3
三. 王明反“调和主义”与共产国际	2 7
结 论	3 7
参考文献	3 8

王明反“调和主义”之剖析

张秀华

1930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根据共产国际指示精神，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但时隔不久，共产国际发来了《共产国际执委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明确指出立三错误是路线错误，并间接指责三中全会及其中央政治局没有真正地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王明便根据这封信的精神，率先在党内发动了反六届三中全会“调和主义”的斗争。本文就王明反“调和主义”的一些问题作一剖析，供参考。

一、六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及其功过

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是在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给革命事业造成严重危害的情况下召开的。1930年，国内出现了有利于革命的形势。当时，党中央以李立三为代表的犯

革命急性病的同志，不能正确分析和估计形势，走上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道路。1930年6月11日，李立三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并开始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全党的统治。这条“左”倾路线推行的结果，~~是~~使刚刚恢复起来的白区工作和工人斗争受到严重的挫折和破坏，使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遭到不应有的重大损失，给党和革命事业带来了很大危害。

立三路线的产生，具有复杂的因素。而共产国际“六大”提出的关于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三时期”理论和这个时期共产国际给立三中央关于中国革命的决议、指示是立三路线形成的直接来源。但是，立三路线又有不同于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一些指示精神的一面，如：关于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是否存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对于敌我力量的估量以及制定冒险主义武装暴动计划和成立行动委员会等方面，与共产国际决议和文件是有些不一致的。所以，又必然遭到共产国际的批评与反对。

以李立三为代表的中共中央，为了取得共产国际的支持，于6月12日向共产国际呈报6月11日决议并请求批准。6月下旬，共产国际致电中央政治局，要求停发6月11日决议。但是，李立三并未接受共产国际的意见，擅自将该决议公布了，

这是破坏国际纪律的严重错误。7月16日，共产国际政治秘书处召开扩大会议，吸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瞿秋白、周恩来、张国焘等人参加，专门讨论了中国问题，并于7月23日，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以下简称7月23日决议）。这个决议批评了李立三对于形势的过分夸张的估计和否认革命发展不平衡的错误。7月底，国际执委派瞿秋白、周恩来回国，主持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的错误。

1930年8月下旬，周恩来、瞿秋白相继回到上海后，立即着手停止立三“左”倾冒险计划的执行。9月8日，中央政治局发出了《接受国际关于停止武汉南京暴动的指示致国际电》。随后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制止立三错误在各地的贯彻。所以，事实上在三中全会召开前夕，李立三的“左”倾冒险计划已基本上停止执行了。

1930年9月24日至28日，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①出席会议的共36人，其中中央委员14人，列席人员22人（包括中央审查委员2人，北方局、南方局、长江局、满洲省委、江南省委、青年团和全总党团的代表20人）。会议有四项议程：第一项议程，讨论和接受共产国际7月23日决议，批评李立三的错误。向忠发作了《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周恩来作了《关于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李立三作了

检查发言；瞿秋白作了《三中扩大全会政治讨论的结论》。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三中全会对于中央政治局报告的决议》和《中共中央三中全会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决议案》。第二项议程。讨论国际东方部1930年8月《中国共产党的最近组织任务决议案》，周恩来作了《组织报告》，青年团代表吴振鹏作了青年团组织问题的副报告，通过了《组织问题决议案》。第三项议程。讨论国际东方部1930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职工运动中的任务》（提纲草案），项英作了《职工运动问题的报告与结论》，全总党团代表作了副报告，通过了《职工运动决议案》。第四项议程。选举了中央领导机构。新的中央政治局由委员和候补委员7人组成，李立三继续被选为政治局委员。补选中央委员7人，积极支持立三“左”倾错误的罗迈、贺昌等人被选为中央委员。候补委员8人，审查委员2人。新的中央委员会由委员23人、候补委员17人组成。中央审查委员会由委员和候补委员各2人组成。

三中全会按照共产国际7月23日决议的精神，批评了李立三的主要错误：

第一，批评了对形势的过份估量。指出：李立三没有看到中国革命力量发展不平衡，“没有充分的估计到：目前统治阶级还没有完全削弱完全破产；于是对帝国主义反革命统治崩溃

的形势和可能，对于革命势力的现状，和革命形势发展的速度，都有过份的估量。②因此盲目布置全国武装暴动、政治同盟罢工，使革命的精华受到不应有的损失。

第二，批评了忽略争取群众的错误。指出：李立三迷恋群众的自发性，认为革命高潮一来，群众会一呼百应地参加暴动，因而就不做扎实的、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不到黄色工会中争取工人群众，不领导工人的日常斗争和经济斗争，不主动领导农民的自发斗争。这样，党的口号只能被少数先进分子接受，不能团结广大群众。三中全会决议案明确指出：“‘左’倾的错误，是在于只看到先进分子的情绪，而不去切实艰苦的去争取群众”③。

第三，批评了忽视根据地建设的“无后防作战”错误思想。李立三在城市中心论的思想指导下，积极布置大城市的武装暴动，却不注意根据地的建设。他命令红军远离根据地进行力不胜任的进攻大城市的任务，以配合城市工人斗争。三中全会指出：“目前党的第一等重要任务是建立苏维埃根据地，巩固它，发展它”。④

第四，三中全会批评了在民主革命中实行一些“左”倾的或属于将来才能实行的政策，也批评了急于实行革命转变的错误。

第五，批评了成立“总行动委员会”的作法，恢复了党、团、工会的正常组织活动。

这样，三中全会就结束了作为立三路线主要特征的那些错误，对中国革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在三中全会后，李立三已离开原来的领导地位，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全国准备暴动响应的计划已经取消，红军进攻大城市的命令由于二次进攻长沙失败已不再实行，中央和地方革命行动委员会的组织已经撤消，党、团、工会的组织已经恢复，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工作已提到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各地党组织也根据三中全会的精神，采取措施，纠正“左”倾的盲动错误。当时，在江苏省委工作的刘晓回忆说：“六届三中全会之后，省委决定派人到外县去停止执行立三路线的暴动计划。我被派去常州、宜兴、镇江、苏州一带传达。我跑了几个地方后，更感到李立三盲动主义对全国形势的估计和组织暴动、总起义是没有客观基础的，是错误的。我遇到几位县委书记，都表示赞同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他们说，敌人控制很严，暴动本来就搞不起来，也应该吸取教训”。⑤

总之，经过瞿秋白和周恩来的努力，李立三的“左”倾错误，不仅在三中全会上受到了批判，而且在实际工作中也正在进行纠正。因此，对于三中全会的功绩应该予以充分肯定。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三中全会没有缺点，实事求是地讲，三中全会存着较为严重的错误。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在政治上对立三错误的严重性认识不足，仅仅把立三路线错误归结为“在策略上犯了‘左’的个别冒险倾向的错误”。^⑥ 向忠发在《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中说：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是与国际路线完全一致的”，但是，由于对“革命形势的估量，在它发展的速度与程度上却犯了过分的与不正确的错误”和对“革命发展不平衡的特点，有所轻视”，因此，“在策略上便犯了‘左’的个别冒险倾向的错误”^⑦。周恩来在《关于传达国际决议报告》中，批评李立三由于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和否认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因而，“将前途的某一可能”“作为今日要做的根据”^⑧，“遂致造成中央个别的策略上的错误”^⑨。关于立三错误的性质是否路线错误，是否和国际路线不同呢？《报告》指出：“完全不是的，路线上没有什么不同的”^⑩。会议通过的《关于政治状况与党的总任务决议案》中强调指出：“纠正政治局过去策略上的错误，决不是变更党的路线”^⑪。《对于中央政治局报告的决议》还批评了“党的路线是同共产国际的路线对立的”说法，指出了这是“暗藏在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企图反对党的路线，破坏党的领导机关的威信”，“完全是公开的造谣”^⑫。

第二。在思想上错误地强调右倾是党内的主要危险。提出了集中火力打击右倾。在三中全会召开以前，李立三在实际工作中的错误已经基本上纠正了。三中全会的任务还应当从思想认识方面肃清“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然而，三中全会没有完成这方面的任务。相反，错误地强调反右倾。三中全会在有关报告和决议中，虽然也提到反对“左”倾的任务。提到必须“实行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反对左右倾和调和主义”^⑬但却错误地提出“党内主要的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⑭。要求“集中火力打击主要的右倾危险”。在三中全会上，中共上海沪中区委书记何孟雄即被认为是“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⑮的代表，受到攻击。

第三，在组织上还继续着宗派主义的错误，打击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加剧了党内矛盾。这种错误表现在集中火力批判何孟雄身上。何孟雄是我党反立三路线最早和最坚决的代表。作为一次纠正立三路线的中央全会，不仅没有肯定何孟雄在反立三路线中的功绩，摘掉立三路线强加在他们头上的政治帽子，反而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何孟雄。

向忠发代表中央政治局的报告中，把“战胜了托洛茨基主义与陈独秀等取消派”和“打击了何孟雄的调和派的主张”^⑰，并列为党从二中全会到三中全会的两大成就。并指名批评说，

“右倾机会主义者如何孟雄竟利用中央某些错误，加以造谣诬蔑，来实行反中央的活动”，“公开向党进攻”，“起了取消派党内暗探的作用。他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必须全党与之作无情的斗争”^⑮。李立三在发言中也指责说：“取消派暗探利用时机来反党。江苏何孟雄认为中央反国际，造谣言，来发表他自己路线。他不是纠正党的错误，而是乘机来攻击党的路线”^⑯。瞿秋白在最后作结论时指出：“中共中央最近有一点错误，决不是总的政治路线不正确，而右倾机会主义的分子却利用来反党，我以为孟雄的立场显然是这样的……我们必须将……何孟雄问题公诸全党，在政治上郑重解决”^⑰。

关于六届三中全会批判何孟雄的问题，建国后，周恩来曾于1960年7月14日和15日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报告中，作过这样评价：“三中全会在组织上也有些错误，例如批判了何孟雄……三中全会补了一批中央委员，就是没有补何孟雄，其实那个时候，他的意见还是对的多”^⑱。

总之，三中全会“表现了对立三路线调和妥协的精神”^⑲。但无论如何三中全会还是结束了作为立三路线主要特征的那些错误，它的功绩是第一位的，缺点是第二位的。

然而，王明等人后来利用三中全会的某些缺点，用来攻击三中全会和推行更“左”的冒险主义政策。他们不顾客观事实，

把三中全会说得一无是处，全盘否定瞿秋白和三中全会在纠正立三路线中的作用，竭力夸大瞿秋白和三中全会在对待立三路线问题上的调和错误。王明断言：瞿秋白和三中全会“是自觉地对立三路线调和投降，是立三路线的拥护者。他们极力企图在接受国际决议的名义下来调和与继续立三路线”^②。这种对三中全会缺点的无端的夸张，是不符合实际的。根本站不住脚的。

首先，三中全会并不是“自觉地对立三路线调和、投降”，而是在贯彻国际指示，揭发批判立三错误的过程中，表现了某些调和、妥协的倾向。三中全会是根据共产国际7月23日决议精神来纠正李立三的错误的。当时，我们党尚未达到政治上的成熟，对于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现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自然缺乏深刻的认识，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仍然没有统一起来，党还缺乏独立地认识 and 解决问题的能力。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指示，总是被认为百分之百的正确，必须贯彻执行。三中全会对立三路线所表现的调和妥协倾向，实际上是执行共产国际7月23日决议的结果。7月23日决议没有明确提出立三错误是路线错误，三中全会就把立三错误归结为“在策略上犯了‘左’的个别冒险倾向的错误”^③；7月23日决议认为“右倾对于党的当前任务的顺利进行，

是主要危险”^{②③}，三中全会也错误地指出“右倾是现在阻碍党去执行当前重要任务的主要危险”^{②④}。

可见，照抄照搬国际指示，不懂得结合本国实际情况决定问题，这是三中全会犯调和错误的根本原因。就是说，三中全会的调和错误，还仅仅是个认识问题和思想方法问题，而决不像王明所说的是自觉地对立三路线调和、投降。

其次，三中全会不是“极力企图在接受国际决议的名义下来调和……立三路线”，而是确确实实地接受了国际决议。三中全会是完全按照共产国际7月23日决议指示精神办事的，正确的方面照办了，错误的方面也执行了。由于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就其思想理论体系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共产国际，因而共产国际没有也不可能对李立三的“左”倾思想理论体系给予彻底的批判。相反，7月23日决议本身就存在着错误。它依然重复着“第三时期”理论指导下的进攻战略和反右倾方针。只是批评和反对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的策略错误。三中全会正是由于贯彻了这个决议，才没有能够对立三路线的思想实质进行彻底的清算和纠正。从而表现了对立三路线的调和倾向。

第三，三中全会并不是“继续立三路线”，而是批评和纠正了作为立三路线主要特征的那些错误。勿庸讳言，瞿秋白和

三中全会的确对立三路线的严重危害缺乏认识，对立三路线的思想实质也没有清算和纠正。仅仅把立三路线的错误看成策略上的错误。王明抓住这一点，而且竭力夸大，肆意攻击。说瞿秋白“在拥护立三错误路线的原则之下来继续立三路线”^②，“三中全会的政治决议变成掩护立三路线的产物”^③。我们只要认真地客观地看看三中全会的决议，不难发现，它并不是一个拥护立三路线的决议。它对立三路线的主要错误进行了批评，尽管还有批评不够的地方，但它的基调是批评而不是肯定，主要精神是纠正李立三的错误，而不是拥护立三路线和坚持要继续立三路线。三中全会《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决议案》明确指出：“立刻完全纠正这错误，而在一般策略上工作上，实行必要的转变”^④。

王明等人夸大三中全会的调和错误，并用尖锐苛刻的语言否定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不是无源之水。六届三中全会虽然是根据共产国际指示精神来纠正李立三的错误，但是后来共产国际发来了《共产国际执委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改变了原来对立三错误的看法，明确指出立三错误是路线错误。王明等人正是根据共产国际这个精神，站在宗派主义的立场上，在党内掀起了反六届三中全会“调和主义”的浪潮。

二、王明在党内率先发动反“调和主义”的斗争

由于六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的中央对立三路线的停止起了积极作用，从而使党内在反立三路线斗争中一度激化的矛盾趋于缓和。曾经起来与立三错误作过斗争的党内各派力量，都已表示和新中央合作的态度。

当时受到留党察看6个月处分，下放到江苏省委宣传部工作的王明，听到六届三中全会的文件传达后，表示同意三中全会的报告。三中全会后，中央决定派他到江西中央苏区参加实际工作，他也表示接受，准备前往。就是后来他大反特反三中全会时，也不能不说：“三中全会有重大的意义的（如停止全国武装暴动的进行，取消总行委和恢复团和工会的独立系统，及承认国际路线的正确……。）”^③ 罗章龙、徐锡根、王克全等人也表示支持六届三中全会。罗章龙在三中全会上发言，对于三中全会的报告和决议表示完全赞成。

10月间，共产国际执委发来了《共产国际执委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以下简称十月来信）。来信完全改变了7月23日决议的调子，明确指出，立三的错误是政治路线问题，“不是什么不同意，或者是估量时机和了解策略任

务上的次要的不同意见”^{③①}。“他所做的错误，并不是个别的错误。他造出了许多错误观点的整个系统，定下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针”^{③②}。“这个方针，虽然用‘左倾’的空谈遮盖着消极，实质上亦是机会主义，例如托洛茨基主义亦是这样的”^{③③}。因此，“这条路线是和国际执委的路线互相对立的。”^{③④}，是“两条原则上不同的政治路线互相对立”^{③⑤}。十月来信还指出：“模糊混淆这两条路线的原则上的不同，这两条路线是互相反对不能并存的——那就不但有害，而且要包容将来重复这些错误的极大危险”^{③⑥}。

虽然十月来信写于十月，但一直到11月16日中央才接到来信的正式文本，在此之前并不知道十月来信的内容和消息。然而，这时尚在莫斯科的沈泽民、夏曦、何凯丰、陈昌浩、李竹声等，从共产国际和米夫那里知道了国际十月来信的内容。十月下旬，他们陆续从苏联回到了上海，同时也就把十月来信的精神带到了国内。沈泽民等带回十月来信的精神后，没按组织程序首先向党中央汇报，反而首先告诉了王明。

王明得知十月来信的消息后，一反拥护三中全会的态度，公开打起了反三中全会的旗号。王明之所以转变得如此迅速，不是偶然的。一方面，王明拥护三中全会，是因为三中全会是根据共产国际决议精神召开的。首先，他知道三中全会是根据